

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

喬治·凱南著

商務印書館

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

乔治·凯南著

王殿宸 陈少衡译

商 务 印 书 馆

本書系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乔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 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一書譯出。

作者在美国外交界任职多年,曾任美国駐苏大使,卸任后在普林斯敦大学执教,于1954年3月發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講演稿。

凱南的意見和今天执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那些統治者的意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們之間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凱南对国际局势有一些較為现实的估計和看法。由于凱南的意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本书可供研研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参考。

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

乔治·凯南著

王殿宸 陈少衡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总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刷 源丰厂裝訂

統一書号 3017·2

1958年5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2¹/₁₆

開本850×1168¹/₃₂

字數64,000

印數1—1,500

定價(7) 0.32

譯者序

本書作者喬治·凱南是公認的美国外交活動家和理論家。在資本主義世界及統治集團內部，喬治·凱南被稱為“蘇聯問題專家”。他曾經一度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人之一。

喬治·凱南現年五十三歲，1925年畢業於美國普林斯敦大學。以後，他進入美國外交界，被派往柏林服務，在那里他專修俄文達五年之久。1934年凱南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三等秘書，開始成為美國駐蘇使館的“蘇聯問題專家”。1945—46年他被提拔為美國駐蘇使館公使銜參贊。1947年凱南任馬歇爾（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領導下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參謀室主任。

1947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出現了一篇署名X的、內容是宣揚“遏制”蘇聯政策的、轟動一時的文章，其作者正是喬治·凱南。這篇文章建議美國對蘇聯採取“遏制”政策。此後，這種“遏制”政策就成為美國對蘇政策的基本方針，代替了貝爾納斯的“強硬”政策。

1950年凱南一度脫離國務院，轉入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當研究員。同年他在普林斯敦大學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美國對外政策“理論”的演說，後來這些演說稿被編輯成書，在1951年以“1900—1950年的外交”為書名出版。

1952年凱南任美國駐蘇大使，同年10月由於在柏林發表反蘇言論而被蘇聯政府宣布為“不歡迎的人”，從此離開了莫斯科。

喬治·凱南回國後在普林斯敦大學任教，並繼續任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的研究員。1954年3月他在普林斯敦大學又發表一系列有關美國對外政策“理論”的演說，1954年4月將它出版，就是這本“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

1955年9月乔治·凯南代表美国去意大利参加“世界文化与自由”大会。直到最近，他仍然就美国对外政策問題發表一些言論，并且受到国际輿論的重視。

乔治·凯南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論”获得了美国統治集团内部一定阶層的贊同。他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輿論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大家知道，美国今天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是以凯南所提出的“遏制”政策为基础的。目前这种“遏制”政策不是改变或减弱，而是加强了。因而，研究乔治·凯南的言論对于我们是有现实意义的。

全世界的人民都認識到，美国統治集团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無疑是造成国际緊張局势的根源。美国的侵略政策越来越引起世界广大人民的憎恨和反对，甚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認識到这种政策的危害性；美国人对他們的統治集团所奉行的政策的批評也越来越頻繁了。更值得耐人寻味的是，甚至在美国統治集团内部，某些曾經参与制定这种政策的人也起来譴責它了。从这个角度看来，乔治·凯南在1954年出版“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一書，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乔治·凯南指出，他發表这些演說的目的是在于使人們懂得一些他本人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論”。

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献策人和执行者的乔治·凯南，是民主与和平的反对者，是我們政治上的敌人。“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一書無疑地包含着許多反动观点和毒素。因此，揭露和批判凯南的理論的反动实質是我們义不容辞的責任。苏联維克托洛夫同志在“国际生活”1955年第二期發表的“評乔治·凯南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的理論”一文，可供讀者参考。

“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一書說明：凯南对于美国現在所奉行的对外政策冒險的本質感到惶恐与不滿。固然，凯南以向美帝国主

义进忠言的策士身份批評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但實質上,仍然为美国所奉行的“实力地位”政策、“擴張”政策作辯护。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乔治·凱南是一位头脑较为清醒的政客,对国际局势有较为现实的估計和看法。凱南正視当前国际关系的某些现实局面,承認資本主义發展的不平衡加深了資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承認資本主义世界中殖民地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瓦解,是与阶级矛盾的加剧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事实面前,凱南不得不抛开所謂苏联“侵略”的謊言,并且不得不承認:苏联在战前及大战后“从未希望战争”。凱南反对把一切国家的共产主义活动归咎于莫斯科,不相信苏联“輸出革命”的謊言。凱南反对与苏联作战,認為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他所根据的理由有二:第一,不应过低估計苏联的力量;第二,这场战争在全世界將極為不得人心。从这些方面看来,凱南似乎确实比今天执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那些統治者对世界局势及苏联的真象有着较为深刻而现实的了解。

乔治·凱南从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扞衛者的立場出發,批評了几十年来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所犯的种种錯誤。他批評說,二十世紀以来美国政治家們在战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策划上忽視了“实力因素”。他譏笑那种認為世界和平是基于“用签订条約的方法来安排一个恰当的体制”的看法。他把这种看法称之为“夢想”。他指出,战前几十年美国政治策略的重点放錯了,放在仲裁条約和裁减軍备上。他批評美国人对于战后国际舞台上真正力量对比关系缺乏足够的了解。依照凱南的看法,應該把全球划分为两个世界——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对付非共产主义世界,过去美国使用的老办法,如“援助”、和平的胁迫等等現在仍然适用。对付共产主义世界,他主張采取“遏制”政策。在这里,凱南承認了他的主張的反苏目的。他說,美国統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仅仅是关于“达到

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由此可見，凱南是从反苏的目的出發来批評美国的对外政策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凱南不能給美国对外政策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凱南建議：对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不在于直接对付苏联，而在于如何处理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内部关系。社会主义的敌人从来沒有忘記破坏和分裂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在这里，乔治·凱南毫不掩飾地說，美国的恩惠和美国影响的范围不仅包括非共产主义世界，而且也包括所謂在苏联压力下的国家（指社会主义陣营里的国家）。我們从来認為敌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师。为了粉碎敌人的陰謀，我們應該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

凱南借口“遏制”苏联的“扩張”以實現美国进一步的扩張。他自信能把英国和日本置于美国控制之下，并且非常重視將西德保持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內。

乔治·凱南想使全世界人接受美国的領導。但是，正如苏联維克托洛夫在“評乔治·凱南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的理論”一文中所指出的：“自由的太陽早已在东方升起来了，而且已經創造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吓倒了凱南，使妄想統治全世界的卑鄙野心家感染了白痴症。凱南陷入矛盾百出的境地。然而他的言論还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清醒，这甚至常常影响同美国統治集团極為接近的人。至于說到美国广大階層的人民，和平共处的思想正深入他們的內心，因为这种思想是符合世界安全和美国本身的民族利益的”。（見苏联“国际生活”，1955年，第二期。）

乔治·凱南在苏联强大力量的事实面前，得出結論說：“苏联問題虽是一个大問題，但这是不适于用战争来解决的問題。”他反对“战争”、“解放”政策。他反对全面战争。早在1954年，凱南就注意到苏联强大的事实，他因美国統治集团内部某些人士未充分重

視苏联的强盛而感到不安。他甚至恐慌地說，“我們对苏联的实力在地理政治上对我們的威胁，依然認識很少。”他了解到，如果进行反苏战争，势必造成大量的物質財富的毁灭。他說，“全面战争已經过时。”他主張进行局部有限战争。这种“局部有限战争”的思想，在苏联試驗洲际導彈成功和發射人造衛星以后再一次得到抬头。

但是，在今天世界已經开始进入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紀元的时候，在今天世界局势是“东風压倒西風”的时候，我們满怀信心地說，和平共处必将更广泛地深入人心，而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冷战”政策最終必将遭到可耻的失敗。

凱南所主張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方針，其主要之点在于采取“遏制”政策来对付苏联。这种政策意味着在資本主义世界内部加强美国独断独行的政策，从而反对和削弱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势力”；这种政策意味着更多的軍隊、更多的包圍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基地，以及复活西德軍国主义，重新武裝日本和大量扩軍备战。不难看出，乔治·凱南仍然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不能解脫他本人对于苏联的極端仇視和对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和平竞赛的恐惧，另一方面他又不敢依靠發动反苏战争的政策。

如前所述，乔治·凱南曾長期在美国外交界活动，他企圖以他丰富的資產階級外交經驗和他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刻理解，加上华丽的詞藻、冗長的說教，把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見有系統地化为“理論”，以便抬高本書的价值和作者本人的声望。本書的文字有許多地方都是意义含糊，模稜兩可，乍看起来令人不得要领，这正是資產階級外交官的特色。

本書譯稿在商务印書館編輯部校訂加工前，曾由王萃波同志初步校訂一遍，特此志謝。

王殿宸 1957年11月，北京，外交學院。

目 次

譯者序.....	iv
I. 国际现实的两个方面.....	1
II. 非共产主义世界.....	22
III. 苏联势力的問題.....	43
IV. 統一的因素.....	61

I. 国际现实的两个方面

这一系列的講課是为了結合当前外交事务上的問題來說明我国政策所要应付的某些比較基本的外在现实，以及我国社会的內在性質和目的。我希望，这門課講完的时候，我能够向你們談清楚一些可以說是我个人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哲学。

当一个人談到任何一門哲学的时候，总是不知道从什么角度來談它。不过，在对外政策上，我們可以借助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們所談的是一个实际的事物（政府职能之一），而且是一种很久以来就进行着的事物。我們关于对外政策的概念和看法，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都反映着長期历史經驗的积累。这里，我也許会被那种把美国的过去理想化的趋向，一种我們这一代人所容易感染的怀归病，导入歧途。不过，我确实認為，早期的美国政治家們在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一般說來比我們这一代人对自己的企圖有較好的認識——至少是一个較為明确的認識。因此，当目前的問題过于复杂的时候，我有时發現有必要回顧一下，这种思想和现实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脫节的（因为它們在很多方面显然是这样的），以及如果我們要把这些混乱的現象整理好，必須追溯到什么阶段。

因此，我准备在今天晚上做一个簡要的历史介紹。如果这个介紹對你們所要求討論的迫切問題看来似乎过于慢条斯理和不相关的話，請你們原諒我。到时候我們自然会討論那些迫切問題的。同时，我还可以告訴你們，當我們談到那些迫切問題的时候，那些問題仍然会在那里等待着我們，而且仍然是非常迫切的。在这段

時間內，大概沒有一個問題會得到解決。

因此我提議，在開始考慮問題的時候，我們先要有一種理論上的認識，這種認識我認為我們美國人的思想中是往往缺少的。這就是，不應當把對外關係的處理看成是一個政治社會（指國家——譯者），特別是一個民主政治社會的目的，而是要把它當作達到某種較高的和較全面的目的的手段之一。我這是說，政治社會不是為了處理對外政策而生存，更確切地說，政治社會是為了生存而處理對外政策的。誠然，我們國家生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我們和其他國家打些什麼樣的交道；而是在我們自己人中間、在我們所負責的美國國土上所發生的事情。總之，我們的對外政策只不過是達到一個目的的一種手段。這個目的必須包括在我們認為是美國社會的一切總目標之內。

這些目標是什麼呢？為什麼我們在北美大陸上要保持一個我們對它熱愛、忠誠並引以自豪的政治社會，而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政治社會呢？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要達到什麼目的：僅僅為了在這塊土地上確保維持居民秩序的一般例行公事的目的呢？或者還有其他目的？

我想不僅是為了這個。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歷史上或者當代的其他獨立國家，我想我們可以看到，每個國家都有一個超出政府例行公事的總目的——國家全部政治生活所致力於的目的，並且以此來說明這個國家作為一個單獨的政治實體而存在是合乎情理的。這個目的往往可能是不很成熟的，而且不是很明白地規定出來的。在某些時候，它可能很容易被感覺到，而不太容易被表達出來。它有時會在某種外在的巨大危險的壓力下被抑制或是暫時被遺忘。但是我想，它總是存在在那裡的。它有時表現在一個王朝的發揚光大及其威信和力量的提高上。它有的時候，就像今天歐洲某些

較古老的和較小的國家的情形一樣，表現在培養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上。在納粹德國，它表現為為了他們自己而發展德國人的黷武精神，並且把征服和統治其他國家作為一種軍事力量的鍛煉。還有，在蘇聯，它在名義上表現為培植一種特定的社會理論，和促進一種想像存在的自然過程，从而使以這一理論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支配全世界。

你們看，這裡沒有一致的東西，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一般形式。這是很自然的。如果每個社會的目的不是獨一無二的和特殊的，那么就完全沒有理由保持一個獨立的國家。任何地方當一個統一的目的在一群邦里（例如當年英國在北美建立的十個殖民地那樣）成為主導的目的的時候，或者當某個征服者成為某一廣大地區的軍事和政治現實的主宰的時候，那麼政治上的統一就會接踵而來，要不然，國家主權獨立的裝飾（如果還保留的話）也就變成沒有絲毫意義的了，就像蘇聯的衛星國家那樣。

那麼，我們國家的總目的究竟是什麼呢？你們說說看，我們保持一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社會不相混同的政治社會，企圖做些什麼呢？

如果我們回過頭去考查我們國家的締造者的思想（他們畢竟是負責決定必須締造一個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的人），那麼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認為政府是一種保護私人享有某些權利的手段，這些權利就是“獨立宣言”里所規定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最重要的是，還有保有財產和處理財產的權利。人們覺得，這些權利是造物主賦予的。人們可以享受這些權利，乃是被認為很自然的、公平的和有益處的。當年許多人都以為英國國王沒有能夠使北美各殖民地的居民享有這些權利。同時，我們大家都記得，我們的先輩為了完全確保享有這些權利，就決定從早先屈從英王喬治

第三的境地中擺脫出来，自己建立一个国家。

你們可以注意到，从这个理論出發，国家本身并不被認為是一种目的。它也不是任何具体的社会綱領的承担者。据我了解，我們的先輩相信，如果讓人們尽可能自由地按他們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話，人类的境遇就最容易得到料想可以實現的进步和改善。很明显，每个公民都能正确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当他按照他所理解的去追求这种利益的时候，他就会給自己和家屬謀得某些东西；把所有这些微小的个人的成就加在一起，就構成我們所时常提到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些个人成就的总和就可以明显地滿足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

从这个概念出發，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进步的泉源并不被認為是直接从政府那里来的。进步并不被看做是行使人統治人的政治权力的产物。事实上，政治权力只被看做是創造文明幸福的自然过程的保护者。政府主要是起一只做好事的家狗的作用。

我是說“主要是”。显而易见，绝对“放任主义”的概念是行不通的。政府即便是在尽它的看家狗的职责的时候，还是不能对一切后果采取一种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可避免的，它必須对所發生的事情担負某种程度的責任。政府畢竟是由人組成的，由我們这样的公民組成的，这些人做着重要的事情并担負着重要的責任。他們行使职权的方式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的發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很早以前人們就普遍承認，政府在决定国家命运上确实起了某些作用，但是这只能是一种次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进展，这种观点就变成了美国所公認的主义。五十年以前，渥德羅·威爾遜在这个学校的講堂里教导人們說：“政府的宗旨就是要幫助一个有組織的社会去完成它的目的。”^①請注

① 渥德羅·威爾遜：“国家：历史政治和实践政治的要素”，第 633 頁。

意，他並沒有說，政府要把完成這些目的的工作包辦下來。他甚至沒有說，政府在完成這些目的的時候起領導的作用。事實上，他非常強調他的這種信念，不能把國家當做“每個政治家庭成員的賢明的養母。”^① 據他的看法，社會的希望仍然寄托在“無限的個人的多樣性，以及個人力量的尽可能的自由發揮。”^②

大家公認，即使是从威爾遜的時代算起，我們的生活也已經經歷了許多變化。境況的變化已經迫使聯邦政府在決定國家生活的發展上起一個遠遠大於威爾遜當初寫下這些話時所看到的作用。特別是在財政和經濟現實的形成上，政府起着一個重要的作用，這使它（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成為我們經濟生活中唯一的最大的仲裁者——特別是我們可以稱之為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起新陳代謝作用的东西的仲裁者。

但是我認為，我國社會的基本情況，即某些基本過程可以得到自由發展及政府的宗旨主要仍然屬於保護和輔助的性質這一情況，並沒有改變；這一點，從對外政策的角度上來看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我們的生活領域中，有很大和很重要的一部分，大體上仍然是政府影響所達不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個人的自由競爭的法則所支配。這裡，我指的主要是技術變革的重大發展，而這些變革又大大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在新技术的創造上，特別是在我們生活中採用新技术的方式上，我國政府沒有實行什麼有效的管制。像汽車、電話、無線電和電視機这些东西，並不是為了它們對社會的意義而計劃或有意選擇出來的。可是，從這些發展中產生了一些重要的力量，這些力量決定了我們目前和將來的社會性質，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社會關係、我們的私人生活

① 溫德羅·威爾遜：“國家：歷史政治和實踐政治的要素”，第 680 頁。

② 同上，第 633 頁。

与我們工作之間的关系，最后还决定了我們自己和我們孩子們能够受到的教育影响。对于所有这些力量，放任主义的法则被認為基本上仍然适用。如果明天有人（也許真的会有人）發明另外一件东西，它对于我們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同上面所提到的东西一样坏，那么我們还是会一声不响地接受的。我們會这样做，因为我們美国社会的基本目的一向是、將來仍然是允許这一类的發展产生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美国社会的目的，我認為在对外政策方面可以得出一些合理的結論，而这些結論，据我看来和美国早期政治家所得出的結論差不多。对美国这些早期的政治家說来，对外政策的問題不外乎是：在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促使这些目的实现？

首要的和显而易見的答复是，我們应当保护我国国家生活的物質上的完整，使它不受外来的軍事的或是政治的侵襲——也就是說，我們应当关怀国家的安全——因为只有沒有外国的敌对干涉的情况下，那些我們認為有益处的过程才能得到完全自由的發展。

第二，当我国的公民在寻求他們的个人利益的时候，如果他們的活动超出了我們的国界而进入了外面的世界，那么我們就应当尽可能地促进和保护他們的利益。这样，我們的政府就很快地發現了（而且直到現在还保留着）一个合理的和重要的活动范围：我們应尽可能地給那些在国外从事各种私人活动的美国人以最大的帮助和保护。从外交事务上來說，这就意味着要做許許多多的事情。它意味着商業政策、通商条約、对美国航运業的保护，以及其他千百种任务，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今天，我們国外領事館的大部分工作仍然是处理这些事情。

为了保护美国人在其他国家的私人活动，我国政府一般是遵循这个理論：这种私人活动事实上是有益于国家的最高利益的。我国政府通常是不过問美国人在国外做的每一件具体事情的，也不审查它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你們記得，我們的先輩承認过，讓每个人去寻求他私人的利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也就是政府所要保护的，至于这些事情的價值如何，政府是無需过問的。不过，这也就是我們以后講課中所不得不加以探討的某些假設之一。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确保国家安全和促进美国人在国外的私人活动这两种任务，的确是直接地和合乎邏輯地从美国社会的原来的目的演繹出来的。如果你們承認这些，而且仅仅承認这些是我国外交事务活动方針的正当出發点，那么你就会贊成采取一个非常溫和而有节制的政策。它的範圍就是这些固定的、受到限制的目的，只以保护我們生活中的重大进展过程为限。这样的政策不能容許国际上的慈善或自命不凡，也不容采取在道义上优于或劣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态度。从这个观点出發，美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試驗——如果你們願意这样說的話，也可以說它是一种打賭，看一看如果某些进展过程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是否会帶來有益的结果——这里談不到任何救世的趋向，或相信我們对其他人的問題都能提供意識形态上的答复。我們不像俄国人那样，我們手里沒有拿着改造社会的專利的藥品，以便随时把它介紹給所有前来求医的人去治疗一切病症。我們只是对我們的社会怀有某些信念。我們关怀的是，我們是否能够实现这些信念。我們关怀的是，我們的国外环境是否尽可能地有利于这种过程的进展。我們执行的外交事务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只此而已。

另一方面，这个观念并不否定对我們国家安全的真正根源应

加以警惕的、有力的和富于想像力的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我們不应小心而冷靜地注意我們国外的世界（像乔治·华盛顿显然做到的那样），以便發現任何可能給我們帶來危险的根源，而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断然的措施来制止它的發展。为了維護我們国家生活的繼續發展和完整而承認实力的现实性，或是坦率地处理这些现实問題，这没有什么可以覺得羞耻的。

相反地，美国政治家們在十九世紀初期非常坦率地和非常自信地处理了实力的现实問題。他們正确地認識到，欧洲国家不爱护我們，不重視我国制度的价值，忽視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他們有理由害怕欧洲国家在新大陆玩弄陰謀詭計。他們用很大的力量来遏止欧洲国家对这里的領土野心。他們毫不后悔地把我国的主权擴張到太平洋边，以防止欧洲国家在西部領土插足。他們鼓励这个半球的人民脫离欧洲人的政治羈絆，而且他們使我国成为永久保持这种分离（無論是在那里發生）的监护者。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实力問題。然而，那时候沒有人認為这是不道德的，或是运用权术的，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当时大家認為，这不过是应付我国处境的既明显而又合乎情理的必要措施。

如果能够把这些簡單的、基本的目的比較清晰地記在腦子里，我想，當我們討論到二十世紀的問題的时候，我們彼此的意見也許不致过于混乱。

但不幸的是，随着十九世紀的进展，我国外交关系策划中的实力因素，似乎漸漸地从美国人的头腦里消失了。这也許是非常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拿破崙战争末期，英国的胜利結束了欧洲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局面，而我們的年輕的国家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成長起来的。这个胜利為我們奠定了英国海軍霸权所提供的保